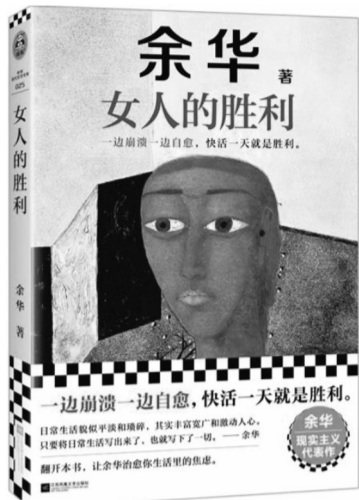


# 寻觅属于自己的光与火

□金爱国



《女人的胜利》  
余华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4年10月

短篇小说集《女人的胜利》收录了余华近年来精心创作的十三篇佳作，每一篇小说都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独特的光芒，引领读者走进一个个充满人性洞察与情感波澜的世界。这些作品让读者在阅读中不断思考婚姻的本质、人性的弱点以及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和困境。

余华，这位当代中国文坛的顶尖作家，以其独特的笔触和深邃的社会洞察力，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幅复杂多变、充满人性光辉与阴暗的画卷。他的新作《女人的胜利》以其细腻的笔触、尖锐的视角和深刻的主题，让人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了强烈的不安与反思。

同名小说《女人的胜利》无疑是这部小说集的核心与灵魂。余华以李汉林与林红的婚姻为线索，展开了一段关于爱情、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深刻故事。林红，一个典型的传统女性，为了家庭付出了所有，却最终遭遇了丈夫的背叛。余华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林红在发现丈夫出轨后的心理变化，从最初的怀疑、不安，到后来的愤怒、绝望，再到实施报复时的痛苦与纠结，以及最后所谓的“胜利”时的复杂情感。这一系列的情感变化，不仅展现了林红内心的挣扎与痛苦，更揭示了社会对女性固有观念和标签的深刻影响。当林红向丈夫的朋友们求助时，他们的冷漠

与无视，无疑加深了她的绝望与孤独感，让人不禁为她的命运感到担忧。

除了林红这一角色的深刻刻画外，余华还通过李汉林的形象展现了男性在婚姻中的困境与无奈。李汉林的关节疼痛、脖子僵硬等身体上的不适，不仅是他身体衰老的象征，更是他内心压抑与无奈的真实写照。他在婚姻中的背叛，虽然令人愤怒，但也让人看到了他在现实生活中的挣扎与困惑。余华通过李汉林的视角，揭示了婚姻中夫妻双方对彼此在生命中比重的评判标准，以及在社会压力下，自我认同与个人自由之间的激烈较量。

除了《女人的胜利》这篇小说外，集子中的其他作品也同样精彩纷呈。例如，《我为什么要结婚》，通过一对年轻情侣的故事，探讨了婚姻与爱情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人们在面对婚姻时的困惑、无奈与成长。这篇小说揭示了婚姻不仅仅是爱情的延续，更是一种责任、一种妥协与一种成长，更让读者在反思中看到了婚姻中的美好与希望。

又如，《我没有自己的名字》，通过一个没有自己名字的人的视角，探讨了个体的身份认同与自我价值问题。在这个故事中，主人公如同一个被社会遗忘的透明人，他遭遇了各种不公与苦难，却无力反抗。他渴望被人认可，渴望拥有自

己的名字与身份，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余华以其细腻的情感描写和深刻的社会洞察力，让读者深入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感受他的孤独、无助与对自我的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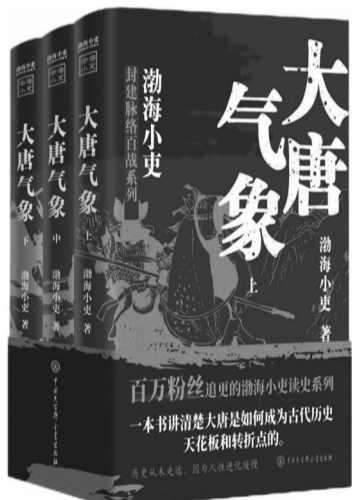
余华的写作风格简洁有力，不堆砌辞藻，却能让读者深刻感受到故事的力量。他用简单的文字勾勒出复杂的故事和人物，让读者在阅读中不断思考人性的复杂与社会的现实。

余华的作品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内心深处深处的恐惧与无奈。他笔下的世界每一个故事都像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的真实面貌与人性的复杂多变。这种不安感虽然让人感到压抑与沉重，但也正是这种不安感促使我们不断思索探寻，寻找属于自己的光与火。

《女人的胜利》是一部深刻反映现实生活、引人深思的作品。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在社会压力下，自我认同与个人自由之间的较量与冲突，更让我们思考了婚姻中夫妻双方对彼此在生命中比重的评判标准与责任担当。余华通过细腻的笔触和深刻的洞察力，让我们在阅读中不断反思与感悟。尽管他的作品让人感到不安与沉重，但正是这种不安感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生活的本质与人性的复杂。余华的作品不仅是对现实的深刻剖析，更是内心的救赎、挣扎与成长。

# 用“破案”的方法解读大唐历史

□诸纪红



《跟着渤海小吏读历史：大唐气象》  
渤海小吏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23年10月

历史如长河，大唐是其中璀璨夺目的一段。《跟着渤海小吏读历史：大唐气象》这本书，就像一把钥匙，开启了通往大唐岁月的大门，让人得以一窥其波澜壮阔的兴衰历程。

一开篇，渤海小吏从隋帝国的崩塌写起，隋炀帝的种种“操作”让隋王朝“开始系统性崩溃”，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纷起，天下大乱。而驻守太原的李渊父子瞅准时机，顺势而起。其中，李世民的表演尤为突出，他带着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展现出了精明的成本核算、超常的时机把握能力，以及在雀鼠谷之战中令人惊叹的“天神般的战力”，为大唐的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经历了隋末的动荡后，大唐迎来了贞观之治，这是大唐的辉煌时期，也是李世民政治智慧的集中体现。他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始终保持着对百姓的关爱和对政治局势的敏锐洞察。他开疆拓土，丝绸之路的开拓，更是让大唐的威名远播四海。但在这辉煌的背后，也隐藏着人性的复杂性或多面性。渤海小吏通过对李渊、李治、姚崇、李林甫等人的心理分析，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历史人物内心的挣扎与抉择，感受到了人性的光辉与阴暗。

随着历史的推进，大唐迎来了开元盛世，这是其巅峰时期。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百姓安居

乐业。然而，盛世之下也潜藏着危机，历史的裂缝已悄然侵蚀着大唐的国运。安史之乱的爆发，犹如一场风暴，成为了大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的爆发，一方面源于唐玄宗后期政治的腐败，另一方面安禄山手握重兵且心怀异志，他以“忧国之危”和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叛军一路势如破竹，直逼长安，大唐的半壁江山瞬间陷入战火纷飞之中。渤海小吏在书中详细描绘了这场战役的惨烈与悲壮：“安史之乱，让大唐的繁华如梦一场，昔日的辉煌，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渤海小吏在书中的描述，让人不禁感叹历史的无情与残酷。这场内战，不仅让大唐损失了无数的精兵强将，更让国家的经济、文化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渤海小吏的写作风格独具特色。他用“破案式”的写法解读历史，以《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为据，对重要历史事件如玄武门之变等进行深入剖析。先抛出话题，再层层推理，逻辑严密，让读者如同置身于历史现场，亲眼目睹重大事件的发生，使历史解读极具可信度。比如在讲述李世民“一战灭国”的故事时，据《资治通鉴》记载：“秦王世民引兵自将击薛举之子仁果于折塢城……”详细描述了战争的前因后果和双方的决策过程。薛举入侵涇州，李世民起初选择深沟高垒不战，因为他清楚薛家粮道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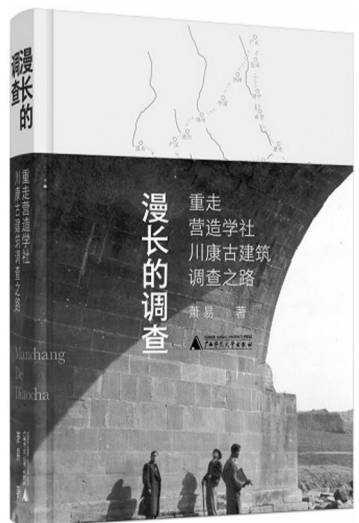
难，而自己背靠关中，军粮充足是优势，之前战败导致的士气低落是劣势。但刘文静和殷开山不听从李世民的安排，贸然出战，结果唐军大败，“士卒死者十之五六，大将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全都落薛举手里了”，这鲜明地对比出了听从正确战略与冲动行事的不同结果，也让读者看到了战争决策背后的复杂性。

作者还擅长讲故事，语言幽默风趣又通俗易懂。他把唐太宗李世民比作“超级CEO”，把武则天比作“女皇帝中的战斗机”，这些巧妙的比喻既让人会心一笑，又让历史人物跃然纸上，鲜活生动，降低了历史阅读的门槛，使普通读者也能轻松地沉浸于大唐的故事之中。

这本书的价值不可小觑。它成功地普及了历史知识，让更多人能对大唐的历史产生兴趣。通过讲述大唐的兴衰，引发了读者深刻的历史思考。大唐从贞观之治的繁荣昌盛，到开元盛世的巅峰，再到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衰落，这一系列的变化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若要强大，开明的政治、强大的军事、繁荣的经济和多元的文化缺一不可；而若要长治久安，则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不断改革创新，防止腐败和内耗。此外，书中融入了励志故事和个人成长等元素，也让读者从历史人物的经历和决策中学到应对挑战、把握机遇的方法，对个人的成长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 当梁思成错过了梁思成

□禾刀



《漫长的调查》  
萧易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8月

在四川剑阁县与阆中市交界处有个香沉镇，香沉镇上有座始建于元代的香沉寺。在香沉寺丁袱上的题记里，讲述了香沉寺的创建历史，其中赫然写着“梁思明、梁思永、梁思成、梁思恭”等参与建造该寺的梁家兄弟的名字。

1939年11月，中国营造学社在开展川康古建筑调查途中，梁思成一行曾到过香沉镇所在的剑阁县。营造学社于1930年2月在北平正式成立，朱启铃任社长，梁思成、刘敦桢分别担任法式、文献组的主任。学社主要从事古代建筑实例的调查、研究和测绘，以及文献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编辑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1938年春，历经两年战乱辗转，中国营造学社在昆明复社。1939年8月27日，营造学社冒着头顶的飞机轰炸，开启了四川、西康古建筑调查活动。本次调查，前后历时173天，走访了巴山蜀水35个县市，调查730多处汉阙、崖墓、摩崖石刻、寺院、祠庙、塔刹等古建筑、古遗址，拍下3100多张照片。

本书作者萧易热爱地理寻访，对川蜀大地的古建筑古物件如数家珍。十多年前，萧易发现，在梁思成先生遗孀林洙女士手中还保存着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的照片，欣喜万分，于是决定重走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之路。

营造学社的田野调查艰难程度在今天很难想象，一方面日军飞机在头顶狂轰滥炸，另一方面由于连年兵燹，国穷民困，川康地区虽然不是抗日前线，但交通、生活条件同样差至极点。一路上，考察团成员不得不与灰尘、阴雨、臭虫相伴。限于时间关系，营造学社常常“只能沿着官道、驿道做调查”，如此一来，难免错过许多地方。

萧易的重走，是对故人当年思想的再探索，对那些照片背后隐藏的叙事再挖掘。萧易重走后发现，“除了飞来寺在峨眉城边，四川已发现的宋元建筑大多地处荒野田畴，且以家庙为主，这才能熬过王朝变迁与岁月流逝。显然，营造学社步履匆匆的考察，并不能覆盖四川广袤的土地”。文头提到的香沉寺因为与考察路线相隔甚远，虽然1939年11月，梁思成、刘敦桢一行确曾到过四川剑阁县，但与近在咫尺的香沉寺依然失之并臂。至于丁袱上的题记里的名字，只是历史上的一次有趣巧合。历史就是这么有趣，香沉寺的建设者们“怎么都不会想到，七百多年后，会有个同名的年轻人在蜀地寻找宋元建筑；而梁思成也怎么都不会想到，他的名字会出现在梦寐以求的宋元建筑上”。

八十年过后，当年被营造学社探访过的古建筑，有的得到了较好保护，如遍布渠县的汉阙，有

的则被开发性保护，化身旅游景点，有的因为种种原因，或挪作他用，拆除殆尽，消失在历史的深处，当年的那些照片成了最后的定格。书后，萧易以20组照片进行了新旧对照，物还在，人已非，令人感慨甚多。

萧易的重走既是一种怀旧，更是对前人严谨治学精神的一次行动式膜拜。事实上，田野调查在民国早成风气。1929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陈翰笙领导了第一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1936年秋，社会学家费孝通根据在吴江的调查结果，写出了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的经典之作《江村经济》。而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王笛近年来先后出版过以成都为主题的《茶馆》《袍哥》《消失的古城》等极有影响力的研究著作，其信息源头主要来自1943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杨树在成都社会实习形成的毕业论文。

回到文头的话题。我们不妨大胆想象一下，即便梁思成当年有幸光临香沉寺，限于资料信息等原因，他未必就能识得香沉寺的元代建筑真相。不过，倘若梁思成有幸看到香沉寺丁袱上题记里有自己和弟弟梁思永的名字时，或许会因这种跨越时空的机缘巧合报以轻松地一笑，为这趟调查平添一点乐趣。